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选择

——兼论冯契的人格理念

宋志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摘要: 摆脱落后、寻求发展是中国哲学从传统转向近代或现代的动因。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历史必然性。在近现代中国，由于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交织在一起，规定了启蒙主体的群体性，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来解决民族动员、社会重建、现代化发展等问题。由于过分强调群体原则，形成忽视个体原则的倾向。这种对新人格理解上的偏差造成严重后果。冯契提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理念，主张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的统一，设计了新的理想人格模式。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冯契; 平民化; 自由人格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冯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提出的“化理论为德性”的论断，依然回响在我们耳边。本文从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的角度，谈谈关于冯契先生“平民化自由人格”理念的浅见，纪念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并就教于学界。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线不是偶然的，有历史必然性。我们只能理解或解释历史，不可以假设历史。既成的历史事实有偶然性，但取决于必然性，取决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科学就是要揭示这种逻辑的必然性。

摆脱落后、寻求发展是中国哲学从传统转向近代或现代的动因。传统哲学比较关注社会的稳定，即所谓“治国平天下”，而不太关注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中国哲学发展理论思想资源不足的问题，向西方寻找真理成为先进中国人的主要选择，进化论哲学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旋律。

1919 年以后，中国哲学发展进入现代阶段。中国现代哲学以进化论哲学为理论起点，三大思潮都是接着这一话题讲的。新的哲学理论主要是要解决如何造就新人、如何促进中国社会形态转型的问题，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生物个体为发展的主体。这种观念被搬到社会历史领域，便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霸权话语引出人文主义的转型。孙中山已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弊端，他提出关于人性与兽性关系的学说，强调人类社会并非

仅仅以个体竞争为动力，群体互助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的着眼点已从个体竞争论转向群体互助论。对群体互助和道德价值的关注引发现代新儒家哲学思潮。传统儒家以维护社会群体和道德理念为宗旨，现代新儒家对这一传统抱有深深的同情与敬意，他们接续这一传统，倡导社会的和谐和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主张本心、道德自我或道德形上为本体来安顿价值体系，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折，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与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不同，并不是在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列强的打压之下被动展开的。在近现代的中国，启蒙运动同救亡运动是交织在一起，主要体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启蒙的主体表现为民族群体而不是个体，有别于西方的启蒙运动。现代新儒家虽然有维护群体的意向，但他们彰显的道德主体还是着眼于个体，并非是群体，因而无力解决民族动员问题和社会重建的问题，无力解决社会发展取向的问题，简言之，无力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现代新儒学只能是一种说法，并不能成为一种做法。它只能影响小众，而不能影响大众。

由于进化论以实证科学为基础，因此助长了实证主义思潮的发展。严复在引进进化论的同时，也引进了实证论。许多进化论者同时也是实证论者，如赫胥黎、斯宾塞；许多实证论者也都以进化论为依据从事哲学思考，胡适曾赞扬杜威是进化论时代的“哲学革命家”。古代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实证论的传统，但进化论的传入使现代中国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发展成为可能。中国的实证主义思潮强调社会的发展、知识的增长，比新儒家更贴近时代。他们举着科学、民主的旗帜，致力于启蒙运动，社会影响力也比新儒家大得多。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主体依然是个体，是“优秀的少数人”。他们强调启蒙的目的仅在于“把自己造成有用的材料”，并不关心民族动员、社会重建等重大问题，其影响力也不可能超出所谓“知识精英”的小圈子。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进化论出现以后问世的崭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它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没有简单地把生物进化的规律搬到社会历史领域，而是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指出的那样，这是马克思做出的重大理论发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重视社会发展的学说，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迈入现代的工业文明指引了方向，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这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家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结论。这对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帮助先进的中国人看

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后发优势，树立起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信心。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把西方发达国家视为自己的老师，希望从它们那里得到真理，实现振兴中华、求强求富的发展目标。然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这种善良的愿望没有可行性。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只希望中国永远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良师益友。正当先进的中国人深感困惑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全世界范围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先进的中国人从旧民主主义屡屡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已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改选更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p1360）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显然比现代新儒家和实证论者正确得多、高明得多。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组织理论，社会并不是单个社会成员的集合，每个成员都隶属于某个社会集团。马克思主义重视社会成员的阶级性，而不是个体性。这种理论对于中国人民处理救亡与启蒙交织在一起的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帮助中国人民认识到，启蒙的主体和救亡的主体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并不是所谓的“先知先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组织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发现，人民群众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指出，应当充分“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因为一切反动派“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主张对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进行启发和教育，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力量，提高革命觉悟，发挥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组织理论的指导下，发现在救亡条件下启蒙主体的群体性，突破了现代新儒家和实证论者把启蒙主体只看成个体的狭隘眼界。李大钊还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组织理论结合起来，提出“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的论断。“物的改造”是指改造人类的经济组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心的改造”是指改造人的精神，树立崇高的理想。李大钊说：“我们的主张是以人道主义来改造人类的精神，同时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人类的经济组织。”^[2]（p68）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就是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的统一，二者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皆不可偏废。

冯契先生对五四时期关于怎样培养新人的讨论作了总结。他指出，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论者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独立的人格”；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

新儒家的基本观点是“讲伦理本位，重视伦理关系”，倡导“儒家的合理的人生态度”；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决群己关系，讲合理的个人主义和合理的社会主义的统一。”^[3]（p306）他明确地表示认同李大钊的观点。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中，他引述李大钊的观点，达15次之多。他沿着李大钊的思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学理上做出更为深刻的阐发，创立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新理念。

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开展艾思奇所称的“新启蒙运动”，造就新人，组织革命队伍。正是这支队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成功之中也隐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理解上的偏颇，那就是过分夸大群体原则而忽略了个体原则。在挽救民族危亡压倒一切、推倒三座大山为首要任务的情况下，强调群体原则是必要的，因为只有依据群体原则才能形成民族的凝聚力或社会团体的凝集力，才能形成改造旧社会的强大力量。正如冯契指出的那样：“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培养共产党员这样一种人格理论，最后归结为三大作风：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在密切联系群众中来进行锻炼、修养，包括自我批评。这样就逐渐使共产党以及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成为教育人、培养人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拿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它的成员，使党具有极大的道德凝聚力。许多革命者为救国救民英勇牺牲，他们是党所培养的共产主义战士。应该说，这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4]（p307）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存在着对个体原则重视不够的问题。冯契先生指出：“由于中国历史环境和斗争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30年代强调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提出了‘个人是历史的工具’的学说。这样一来，未免对人的独立性、人的个性解放有所忽视。”^[5]（p124）

令人遗憾的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夸大群体原则、忽视个体原则的倾向没有及时得到扭转。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对个性原则的限制甚至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要厉害。阶级斗争被说成是“纲”，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同个性原则被视为“翘尾巴”，要求人们做“驯服工具”；试图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解决建设问题，幻想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试图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最后演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量事实证明，过分夸大群体原则、忽视个体原则已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才开始扭转这种错误倾向。他果断地做出彻底否定“文化大

革命”的结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思想，都包含着对个体原则的肯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走向正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冯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深入思考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之间关系问题，旗帜鲜明地批评把二者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在30年代以后，理论上产生了一种偏差。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批判自由主义，批判民主个人主义。在群己关系上过分强调了集体精神而忽视了个性解放；在个人修养上过多地强调了自觉原则、作自我批评，忽略了自愿原则、自我实现、自我发展。”^{[6] (p124)}他从哲学的高度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产生这种偏向的原因：“如果说，理学家把‘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理性绝对化，那末，马克思主义者则曾经有一种倾向，把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绝对化，把这些看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准。这样就陷入了形而上学，最后导致十年动乱的悲剧。人道原则被肆意地践踏，社会主义被歪曲（至多是一个平均主义），李大钊、鲁迅提出的价值新观念，以人民的真正利益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完全被破坏了。这种悲剧不单纯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7] (p125)}这种分析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在这里，不仅表现出冯契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底蕴，而且包含着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契身受迫害，被抄家，被揪斗。最令他痛心的是，自己用多年心血写成的大量书稿，竟然毁于一旦。

一些浅薄的批评者在批评夸大群体原则、忽视个体原则的倾向时，常常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夸大个体原则而否定群体原则。冯契没有这样做，他既反对前一种片面性，也反对后一种片面性。他思考的理论问题是：如何把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统一起来？这成为冯契先生建构新人格理念的着眼点。

三

迈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如何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重要实践价值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冯契先生继承李大钊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统一的思路，借鉴现代新儒家和中国实证论者的理论思维成果，针对长期存在的把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新理念。

冯契心目中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就是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新人。按照他的理解，

“共产主义事业正像马克思说的要‘由于人’和‘为了人’。这个事业要通过新人来建设，而且这种建设是为了使人成为新人。培养人，让人能够真正从事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一个头等的大事。我们搞共产主义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人成为新人。”^{[8] (p309)} 冯契的人格理念既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也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并且把这两种思想资源融会贯通，完成了人格理念的创新。中国传统哲学特别重视人格问题（参见拙著《中国传统哲学通论》），冯契继承了这个传统，同时又超越了这个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他找到了新的讲法。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格理念中，儒家推崇圣人，强调人的道德素质；道家推崇真人，强调人的精神境界。这两种人格理念的共同缺陷是缺少发展的观念，对人的能力素质重视不够，因而很难塑造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人格。冯契着眼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需求，把传统人格理念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新人格的理论设计。这种新人格既有很高的道德素质，也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还有很强的能力素质。总之，新人格是全面发展的人，不是某种单向度的人。

冯契强调，新人格首先应当具备平民的品格。冯契的人格理念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平民化”。这个关键词，是他受到李大钊“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的提法的启发，提炼出来的。“平民化”有别于圣贤化。冯契说：“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近代人对培养新人的要求，与古代人要使人成为圣贤、成为英雄不同。近代人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我们所要培养的新人是一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圣人，也不承认有终极意义的觉悟和绝对意义的自由。不能把人神化，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人有缺点、会犯错误，但是要求走向自由、要求自由劳动是人的本质。”

^{[9] (p309)} 新人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不责人以周，每个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冯契对新人的诠释，完全突破了圣人史观、英雄史观的眼界，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平民化”也有别于权威主义。冯契指出，新人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因为他就是社会群体中的普通一员。在他的人格理念中包含着人格平等的意思。基于平民化的观点，冯契对权威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说：“李大钊、鲁迅已提出了新价值观的基本原则，但后来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过头了，政治成了唯一价值标准，这显然是形而上学。搞个人崇拜，为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对这些都要很好地进行分析，吸取历史教训。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经过历史地考察，作出理论的总结，使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的价值体系真正成为人们比较自觉的原则。”^{[10] (p127-128)} 他的人格理念就是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得到的理论思维成果。

冯契强调，在新人格的身上，应当充分体现出群体原则与个性原则的内在统一。冯契人

格理念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自由人格”。自由以尊重个体的主体性为前提，不承认个体的主体性，当然也就谈不上自由；个体没有自我选择的意志自由，也就无人格可言。所以，讲自由必须尊重个体原则。冯契指出，倘若离开个体，群体不可能单独存在。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群体，只有通过个体体现出来的具体的群体。“时代精神、民族心理、阶级意识等等，都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具体的、充满矛盾的，并内在于无数的个体之中，通过个性的演变而发展。归根到底，群体意识总是体现于个体意识之中，群体意识由自在而自为的发展，即体现于许多个体意识的发展过程。个体只有在受到尊重、受到同情的考察时，才会被具体了解。而只有具体地了解了若干个性及其成长发育过程，才可能把握群众的心理以及体现在其中的时代精神。”^{〔11〕（p59）}反过来说，个体也不能离开群体单独存在。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群体，也没有抽象的个体。个体只能在群体之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化自在为自为，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获得自由。冯契不赞成把群体抽象化、绝对化，在他看来，现代新儒家所说的“伦理本位的人”，并没有现实性。他也不赞成把个体抽象化、绝对化，在他看来，中国实证论者所说的“只救出自己的人”，也没有现实性。他认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把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格。尊重群体原则，表现为人的自觉；尊重个体原则，表现为人的自愿。换句话说，把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统一起来，也就是把自觉与自愿统一起来。

关于培养平民化自由人格的途径，冯契指出以下三点：第一，实践和教育相结合。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不可能脱离社会实践一蹴而就，“人的才能、智慧和德性是不断提高的，是一个无限前进的运动。”^{〔12〕（p312）}只有通过实践和教育相结合的途径来培养人，提高人的价值，才能体现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的统一，获得真正的自由。第二，世界观的培养和智育、德育、美育的统一。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格，“要求人们在理论思维、道德品质、审美能力各个方面都得到适当发展，成为真、善、美统一的人材。”^{〔13〕（p313）}要成为这样的人材，关键在于培养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只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能为人提供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冯契十分重视世界观，称之为“智慧的核心”，但他同时也指出，世界观的教育并不能取代智育、德育、美育，因此应当把世界观教育同智育、德育、美育有机的结合起来。第三，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体现群体原则和个体原则相统一的人格，要培养这样的人格必须通过集体帮助和个人努力相结合的途径。“人格的培养既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和集体的帮助，也需各人的主观努力。”^{〔14〕（p319）}把上述三种途径概括起来，冯契得出的结论是：“在自然和人、对象和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实践和教育结合，世界观的培养和德育、智育、美育结合，集体帮助

和个人努力结合，以求个性全面发展，是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基本途径。这是从总结历史教训以及根据价值体系基本原则的理论提出来的看法。”^{[15] (p318)} 通过对培养途径的论述，冯契进一步展开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理念。

冯契倡导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格模式，也突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格模式，是一种十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需要的理论设计。这种人格理论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为提高物质文明程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精神动力；为提高精神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为提高政治文明程度、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360.
- [2] 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8.
- [3] 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06、307、124、125、309、309、127-128、59、312、313、319、318.

注释:

- 1. 《毛泽东选集》[M].横排本.1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2. 《李大钊文集》[M]下.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4、5、6、7、8、9、10、11、12、13、14、15.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06、307、124、125、309、309、127-128、59、312、313、319、318页。

The Historical Choi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 On the personality ideal of Fengqi

Song zhim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reas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ridding the backwardness and getting the development. It is historical necessity for China to choose Marxist philosophy. In modern china, the movement of saving nation mingled with the movement of enlightenment, which prescribes the nature of group about the subject of enlightenment, and need Marxist philosophy to some problems about national mobilization, social re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To state in exaggerated the principle of group, and form a orientation of neglecting personal principle, which causes a serious consequence about new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ity. Fengqi raised a idea of *Common Free Personality*, asserted the unit of two

principles of group and individual, and designed a new mode of idea personality.

Key words: Marxist; Fengqi; civil; free personality.

收稿日期: 2006-3-4

作者简介: 宋志明(1947-), 男,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